

實踐就是作者在本書中試圖強調的，因為「習慣和物品等徹底地從一種文化移入另一種文化，最終變成後者的一部份，同時還改變了移入文化」（頁126），商業貿易則是改變官僚體系或文化素養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說，西方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以經濟上的優先地位獲得了全球話語權，似乎有淡化其他文明的貢獻之嫌。在持續對歐洲中心論進行批評的同時，反觀柯嬌燕等清史專家近年考察全球比較史的視角（柯嬌燕，《什麼是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那麼或許在全球化日益加強的今天，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是史學研究中的熱門話題。這也意味着須重新思考文化在區域內的碰撞，同時考察它們在邊緣—半邊緣—中心之間的移動，《帽子》則是這種研究取向的重要探索。

《帽子》也是一本在方法論上利用圖象學展開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當然，除了作者重點論述的世界主題，諸如煙草、白銀、奴隸等，本書還包含了大量與中國宗教和思想史相關的洞見，如宗教因素在中西繪畫中的體現等（頁214）。它還提出了一些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例如，商業貿易與軍事組織之間相互影響，因此有必要考察貿易所依賴的政府「政治生態學」，包括軍事組織和技術以及官僚管理。「朝貢體系」下沒有單純的貿易，更沒有主權平等的外交。甚至朝貢關係、禮物和聯盟依賴於儀式和傳統，同時它們又與宇宙觀相連。只有將這些綜合起來考慮，才能解釋明末荷蘭人要求在華（主要是福建）通商失敗的原因。不過，《帽子》一書中留待解決的課題對我們接下來的研究有促進作用。

賴國棟

廈門大學歷史系

***Journeys to Empire: Enlightenment,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Encounter with Tibet, 1774-1904.* By GORDON T. STEWAR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xiv, 280pp.**

西藏向來是一宗教氣氛濃厚和政治敏感的地域。對於西藏的研究，亦大多集中在這兩方面的討論。由雍正五年（1727）清廷設駐藏大臣以穩定西藏區內的政治形勢，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定「金瓶掣籤」以解決靈童傳世

糾紛期間，西藏的情況相對安定。但隨着清廷衰落，中國領土及藩屬相繼為列強入侵，西藏亦於1904年遭受英國軍事侵略。在有關西藏的研究中，人們多以1904年作為英帝國主義正式染指西藏的開始，但1904年前的英國政府和英國人，對西藏的印象又是如何？兩地的關係又是怎樣？英人又是否早有軍事入侵西藏的意圖？若英人軍事入侵西藏，與歐洲的啟蒙運動有什麼關係？本書作者正是嘗試透過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和帝國主義（imperialism）兩概念，討論以上問題。

除了交待問題背景的導論外，全書共有六章。第一章描述1774年前後，蘇格蘭人喬治·博格爾（George Bogle，1746-1781）入藏的故事。博格爾是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駐印度的經理，不少證據已指出，他是第一個進入西藏的英國人。作者認為，博格爾作為成長於歐洲啟蒙時代的英國人，其對西藏的態度應與在帝國主義下的英人有所不同。從博格爾與三世班禪的對話及與朋友的通信中，作者的觀點得到確定。博格爾入藏的目的，是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嘗試與三世班禪溝通，希望在和西藏通商之餘，開拓進入中國的陸路，以減少英國對廣州這個唯一通商港口的依賴。作者提出大量證據，指出博格爾入藏後，對西藏文化非常傾慕。作者希望透過博格爾的例子，指出深受啟蒙時代影響的英人，對其他文化傳統多能以一平等的態度視之，而在這種交往氣氛下，西藏和英國的相處亦大致友好。

第二章討論有關博格爾的一則傳說，即博格爾在西藏是否另有妻妾的問題。從作者的證據中，我們尚未能對博格爾是否在西藏另有妻妾這一問題下定論，但作者認為，當時東印度公司的英人當中，擁有多名妻妾實非常普遍。最少，博格爾的朋友多在印度和尼泊爾等地另有妻妾，而博格爾亦未對兩性問題有保守的傾向，故作者傾向相信博格爾於西藏另有妻妾的傳聞當為可信，從而再論述英人和藏人可能早於1774年或已有通婚的情況出現。

第三章討論博格爾雖然傾慕西藏文化，但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其背後亦隱藏着若干帝國主義的心態。作者指出，博格爾雖然成長於啟蒙時代的氛圍中，對外國文化有一定尊重，但博格爾沒有忘記自己在東印度公司的目的是賺錢，而與西藏溝通是為了通商。故博格爾雖然認為東印度公司的制度或有不當地人民，但為了謀取利潤，東印度公司的存在實屬必要；其對西藏文化雖有興趣和敬意，但卻認為，一旦西藏成為東印度公司開拓商機的障礙，軍事入侵可謂無可避免。博格爾以利益為本的態度，正好為日後英國帝國主義軍事入侵西藏埋下思想上的伏筆。

在第四章，作者討論英人對西藏態度，由博格爾時代的友善接觸，轉變

為軍事入侵。透過英軍將領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於1904年帶兵入侵西藏的事實，作者指出英國的西藏政策已由帝國主義所主導。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榮赫鵬對西藏文化非常輕視，認為英軍入藏，實是拯救西藏人民。縱使其時的六世班禪多次向英軍強調博格爾與西藏人民的友誼，藉以希望說服英軍撤出西藏，但六世班禪的努力卻並不能改變榮赫鵬。事實上，榮赫鵬視西藏與其他亞洲地區沒有兩樣，認為亞洲的文化明顯比歐洲落後，從作者的描述中，我們可知其時英人對文化差異的漠視非常明顯，而對西藏文化的尊重，亦已蕩然無存。

在最後兩章，作者嘗試把討論的焦點由具體事實，帶到造成這些事實的原因。在第五章中，作者首先介紹有關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的概念，再分析啟蒙運動究竟在什麼程度上導致帝國主義。作者指出，在傳統的分析中，啟蒙運動的確有助帝國主義的產生。如啟蒙運動崇尚理性，人類希望透過比較，以得出價值上的高下。此間接造成強行判斷文化之間的高下，以自己文化之標準以衡量其他文化。在對博格爾的進一步分析中，作者指出開明如博格爾，其思想仍難免受制於他所存活的時空。故在英國的經濟和政治等條件均如日中天之際，博格爾亦難免受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

而在第六章，作者再次指出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的思想其實早植根於英人之中，認為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概念，其實可以並存。在入侵西藏後，榮赫鵬開始改變其於入藏前對西藏文化的輕視，更開始對原來的天主教信仰產生懷疑，並且不再堅持歐洲文化比亞洲文化優越，而轉移到關心各種文化間的共通點。作者認為，我們若能從不同的概念和角度分析歷史，當能對歷史事件有一更為全面的了解和更為客觀的評價。

大致而言，本書有兩方面特別值得重視。首先，作者對英、藏兩地的交往史，以及西藏、印度和尼泊爾等地的歷史本身，補充了若干史料。過往有關西藏和英國的交往，主要集中在英國對西藏的軍事入侵及往後的發展，對於英軍入藏前的情況分析不多。作者成功運用大量私人書信和其時的報章報導，讓我們更了解早期英人對西藏的態度，如博格爾對西藏文化的傾慕及其與三世班禪的交往，便為英藏兩地的接觸增添了浪漫色彩。此外，我們常以為班禪喇嘛主要負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事務，達賴喇嘛則主管西藏的政治。但據本書所述，班禪亦有留心西藏的政治事務，並在這一範圍內有一定影響力。是故班禪和達賴在一定程度上，實是競爭對手。而三世班禪與博格爾有關宗教問題的討論，亦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三世班禪的宗教觀和世界觀。此外，本書亦記載了其時英人在東印度公司和尼泊爾的生活情況，間接從英人

的角度介紹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凡此均可謂對鮮為人知的歷史作出補足，對人們日後研究相關地區的歷史有一定貢獻。

另一方面，作者把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這兩個表面矛盾的概念一併討論，並以此為全書的理論架構，解釋英國對西藏政策的改變，這可謂一頗新穎的嘗試。作者不僅解釋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其實可互為因果，彼此衍生，更從博格爾和榮赫鵬這兩人的例子中，進一步認為兩個概念根本同時並存。作者這一主張，當有釐清相關概念的效果。以上乃是本書值得讚賞之處。

本書的論點和結論雖有可取之處，但在推論上，卻有進一步檢討的餘地，乃至我們或可質疑，作者引用的史料和推論，是否能支持本書的一些觀點。首先，博格爾能否代表啟蒙運動時的一般英人？作者以博格爾為例，說明其時英人開放和尊重異國文化的程度。但作者亦承認博格爾的學歷不高，他如何受啟蒙運動影響，尚待進一步論證；同理，博格爾既是商人，其訪藏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賺取利潤，故在利益受到威脅下，亦不難理解其有訴諸武力的想法。若以博格爾代表當時一般英人的想法，恐有以偏概全的危險。

另外，是有關博格爾的藏族婚姻。由於欠缺藏文文獻的支持，作者承認並未能證明博格爾曾有藏族妻妾。作者雖傾向認為博格爾確曾有或不止一段的異地戀情，但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異地婚姻的歷史意義何在？作者引用大量史料以推論博格爾異地婚姻的可能性，但除了為博格爾的個人歷史作補充外，我們未能看到作者的努力有什麼深遠的意義。或許，作者可進一步探討，其時藏人是否認同異族通婚？藏人對接受異族通婚的婦女又有何看法？藏人對與漢族通婚和與西方人士通婚的態度是否一樣？透過類似問題，我們或可了解當時西藏的社會風氣。可惜我們未能透過本書對以上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值得一提的是，若我們同意作者的意見，傾向認為博格爾在西藏另有家庭，則博格爾作為啟蒙時代英人的代表性，乃至啟蒙運動究竟在什麼方面影響英人，都有再作討論的必要。這是因為啟蒙運動衝擊了宗教的權威，在這一背景下，作為教徒的博格爾若同時有不止一段婚姻，雖可視作其信仰已經動搖的例子；但另一方面，啟蒙運動亦是女權運動的開始，男女平等之訴求開始出現，博格爾若受啟蒙運動影響，當不會無視這一訴求的出現。在異地另有妻妾，是否有違女權運動的宗旨？對於博格爾的婚姻問題，我們是否可以說，慾望對人的影響，遠超過信仰和理性對人的影響？而英人又是否只是選擇性地服膺啟蒙運動的某些思想而已？

第三，作者對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的界定略嫌不足，所作討論易有「移動龍門」的流弊。啟蒙運動所涉範圍極廣，由科學發展、對宗教的質疑，乃

至政治改革，都屬於啟蒙運動的產物。而帝國主義的問題同樣複雜，如包括種族問題、軍事和經濟的考慮等，故我們實難言帝國主義主要源於某些思想，而忽視其他促成帝國主義的因素。而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取決於對這兩個概念的界定。不然，我們實難以討論兩者的關係。最後，縱使啟蒙運動和帝國主義確有關係，但這一關係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呢？為何作者以西藏作例子，以說明其論點？英國在亞洲的軍事擴張（如入侵印度和尼泊爾），遠早於1904年對西藏的入侵，而1839年亦發生了鴉片戰爭，若要證明啟蒙運動與帝國主義的關係，甚至說明這一關係的成立時間，西藏恐怕並非最理想的例子。總結而言，本書的題材吸引讀者，亦能為英國與西藏的交往史提供一些史料上的補充，但讀者恐怕難以從中得到更深入的觀點。

趙敬邦
曼切斯特大學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xii, 278pp.**

從19世紀中期創建湘軍贏得太平天國戰爭的勝利，到1898年開始湖南省內改良，再到領導20世紀第一次嚴格意義上的反滿起義、1911年辛亥革命和成立中國共產黨，湖南為中國近代化提供了遠多於其他省份的改良者、軍事將領和革命者。這些參與以上政治事件的湖南人如何認識自己的母省及其與外界（外省和外國）的關係？中國近代史上這些為人熟知的事件對於這些人的意義有何不同？是什麼刺激他們行動？誰是湖南青年的行為榜樣？他們對於未來的理想是什麼？一言以蔽之，他們在清末民初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如何賦予這些喧囂的事件對於中國的意義？這些正是作者關心的問題。以往的研究不是把湖南人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歸因於其獨特的精神和個性，就是歸因於湖南多山的地理環境，甚至認為吃辣椒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本書作者認為思想不是抽象的、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具有多種可能性的，由於自身生活引起的特殊關注的推動，讀者往往為了配合自身的需求來解釋文本的內涵，所以對於思想史的理解最好將其還原到當時的語境。在這種方法的指導下，作者認為近代這一系列政治事件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連續性，而要揭